

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在这个基础上，不同居民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有差别，就可以进行协商和协调，这就自然导出了各种合作，找到合情合理的优化的方案，这种大家互相协调的过程，是社区的一个“功能”。这种根据大家的需要，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互相协商，找到实施办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理”。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变化的过程，了解这些共同生活的人们如何出人出力自己来解决问题，如何从过去的依靠别人代理来做，到现在自己要求建立一个委员会，一个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自理的要求，是构成社区组织的新的因素。

如果我们能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逐步引导人们在社区层次上，一步步走向自理，扩大民主生活的基础和范围，就会从最基本的层次上促进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优化合理的社会生活，使我们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实实在在地上一个台阶，也为中国城市建设建立一个重要的示范。我相信广大居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个新局面。

上海社区建设，离不开上海现代化、国际化这个大的背景。我们要把眼光放开，要看到国际化过程中未来的发展趋势，今天的社区建设，是面向未来的，既要考虑到上海作为中国的重要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要求，也要考虑上海作为亚太地区主要中心城市和世界重要都市的前景。在现代化、国际化的社会条件下，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一些新的特点，生活方式也会有很多不同，社会结构也会有很多调整，家庭、邻里、同事等等关系都在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怎么变，需要我们去研究。比如现在电脑的普及，就在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年轻人接受的最快，受影响也最大，他们最知道其中的道理，在这种“信息时代”——也有人叫“数字化时代”——家家户户都可以通过电脑“上网”，网上还有“虚拟社区”，在这样的时代，社区的意义是什么？社区建设的意义是什么？任何人之间的关系、态度有什么不同？个人、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有什么变化？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有什么变化？这都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像上海这种走在现代化最前沿的城市，这些新的东西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已经不是“未来”，而是“现在”了，是现在每天正在发生作用的东西，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新的东西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这些新东西就是影响我们社会未来的东西，我们的研究，要把这些都包括进去，都考虑进去，把我们的社区研究，建立在既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的基础上，真正造福于身处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广大市民。

我们的社区建设，也必须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保证。日前，江泽民主席强调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这也是对我们社区建设的一个很大的鼓励，这里的“德”，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道德的结合，也正是我们社区建设的努力方向。社区建设，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守望相互、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文明社会，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德建设的一部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事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发挥创造性和探索精神，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把这项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译文选载】

跋涉荒野

——学会寻找自己的路



大卫·菲特曼 (David M. Fetterman)
刘灿灿 译

要想在人与人互动关系丛中找到自己的路，需要科学和人文的融汇。林中探路，推理和逻辑是必不可少。计划、分析和实施都颇费心机，投石问路，步步为营。然而，在这样的旅途中，仍然需要人文的同情和理解。

一、突显的性格

一个成功的田野工作者最显著的性格包括好奇心、学无止境的态度、耐心、真诚和诚实。这些品质可以帮助民族志学者学会熟悉异文化，从而有效的完成田野研究。当然，许多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的概念、方法和技术也是上述特征的有益补充。

好奇心

好奇心是一个成功的田野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质。要揭开社会互动过程的神秘面纱，内在动因之一就是要知道人们为什么那么做——了解他们从哪儿来、准备到哪儿去，一代人如何把价值观传给下一代。为了厘清表面上杂乱无章的现象，田野工作者需要宽容地对待模糊性，从明显的混沌中发现其内涵。

这种探索精神应该是全身心的，但不能是缺乏头脑的，散漫的好奇心不会有任何用处。当田野工作者初次面对发现的挑战时，他的好奇心可能是发散的。但是一个成功的田野工作者知道如何将他的好奇心固定在需要的范围内，如何去有效的探索具体的问题和观点。

学无止境

“学无止境”是掌握一个群体内部运行的基本要求。一个田野工作者必须甘心做一名学生，向那些被研究者学习。基本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明显的甚至似乎愚蠢的问题——也必须要问。角色、象征、权力和权威都需要被探索和记录。被调查者日常生活的方式和琐碎细节，就是田野工作者的每日必需的营养。除了认真学习的态度之外，还需要谦虚的分析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有多少东西被误解，并重新予以正确的理解。

耐心

了解一个系统如何运转需要花费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对新结识的人总是很客气，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人们才会摘掉彬彬有礼但具有误导性的面具，使得田野工作者能够了解到他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田野工作者与被研究者在自然的环境中所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有可能观察到日常生活的多个层面。人们常常会向民族志学者流露他们的思想感情。田野工作者要能够花时间去比较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矛盾性和一致性同样会被揭示出来。

在田野调查中所花费的时间，其质量和数量同样重要。田野工作者必须利用这些时间和人们接触，体会那些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提问问题、进行观察，成为他们日常常规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做会将一种文化中最细微的部分揭示出来。



真诚和诚实

许多特征都会提高田野工作的有效性，包括真诚和信任。这些特征可以帮助研究者与人们建立起信赖关系，反过来也使他们能够直率坦诚的交流。一些互惠的行为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有一种常常可能犯的错误是，研究者可能会按照“本地人”那样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尊重被研究群体的文化，以至于他们觉得不能泄露这个团体中的任何秘密。自相矛盾的是，对一支专业性队伍而言，从事这种“深度卷入”的人又只能是一些其他文化的成员。许多义务是基于这种“既是陌生人又是朋友”的角色——对被研究者和对科学本身都是如此。

真诚的对被研究者感兴趣也是很有用处的。每一个群体都有它神奇之处：它的机能、礼节、服饰甚至运动的节奏。社会是由无数个具有相同的人文精神的现象所组成的，探索这个万花筒一般的世界——无论是与沙漠中的贝都因 Bedouin 朋友在一起还是与城市里的“另类”们在一起——都是丰富多彩而又激动人心的。差异性往往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能会将不同人群的潜在的相似之处掩盖起来。田野工作者不需要热爱人性的全部，人性的某些表达方式是粗暴的、麻木不仁的、危险的。但是，一个好的田野工作者要把假想和成见抛在一边，从而发现一个群体内部的运行方式。某些成功的田野工作者表明，研究中并不绝对有必要与人们始终建立一种完全良性的关系。但是我要说，从长远来看，对被研究者及他们的内在价值真诚的感兴趣，与他们建立健康的关系，都是做研究的最富有成效和最人道的途径。

在田野工作中，要诚实首先要保持本色。人们通常都有一个感情雷达可以探测出一个人的虚伪和不真诚的程度。当地人可以根据服装、语言、肤色甚至怪癖迅速的识别出外来的陌生人。做研究的时候，你的行为最好就像通常和新认识的朋友在一起时那样：有礼貌、谦逊、真诚、必恭必敬，而且乐意与他们熟识。但是，过分表现友好和熟识也会冒犯和疏远别人。熟悉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田野工作者需要自始至终的保持角色一致。比如说，在谈话中生搬硬套当地人海誓山盟的话——仅仅是因为别人都这样发誓——往往会显得虚伪、不合时宜，甚至含有愚弄的意味。进一步的说，一种不具威胁性的、谦虚的行为方式能够使田野工作者更加准确和深入的探索被研究者的思想和行为。

二、传统的概念

由于上述这些特征，民族志学者要带着开放的心灵而不是头脑空空进入到田野工作中。在提出第一个提问之前，民族志学者首先要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一个理论或者模型、一个研究设计方案、具体的数据收集技术、分析工具和一套特别的写作风格。

一些概念决定着田野工作的节奏和步伐。它们包括了解背景状况、自观和他观的视角，以及非判断性取向。这些概念是使问题集中的聚焦镜。

了解背景状况 (Contextualization)

了解背景状况意味着从更大的视野范围来进行观察。比如说，在关于针对辍学者的教育计划的国家研究中，我发现政策制订者正在考虑终止一个项目，因为它的参与率很低——大约 60% 到 70%。我提醒他们，60% 到 70% 的参与率已经不高了，因为作为比较的基准，应该是“零”——学生彻底的逃学。我的这种想法帮助决策者做出了更加合理的决定。在这个例子中，了解背景状况保证这个项目能够继续为辍学者服务。



自观 (emic) 和他观 (etic) 的视角

自观视角——从内人或本地人的角度观察事物——是大多数民族学研究的核心。“内部人”对现实的感觉是理解和准确的描述状况和行为的工具。当地人的感觉可能并不符合客观现实，但是它们能帮助田野工作者理解社会群体中的成员为什么这么做。民族学者往往采取一种现象学取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从一个简单的、线性的、逻辑的视角针对系统运作的方式采取一个先验的假设，这种先验的假设有可能是不着边际的。

比如说，在一项关于民间医疗团体的研究中，运用自观的视角帮助我发现了一个社区中很多人死亡的原因。我发现这个团体中的成员往往依靠当地的药师或草医用一些草药、祈祷、雕塑、蜡烛、香气、肥皂、烟雾和钱来给他们治病。

这些民间医师对于疾病和治疗方法有一套与传统西医的理念和实践相矛盾的解释，但是这个团体中的成员也去看西医，只不过他们不好意思将他们看民间医师的经历告诉西医，而且他们的西医要么不想知道他们这些经历，要么会立刻将他们赶走。这个群体中的成员陷入两种医疗传统的矛盾中，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他们同时既吃民间医师开的药又采纳西医的药方，其结果，轻则是对现代医学的失望，重则是丧失生命。两种医疗传统相互交叠，造成一些毁灭性的结果。传统医师有时用一些很刺激的草药，包括毛地黄，其中含有一种心脏兴奋剂。患者如果同时按西医处方服用含有这种兴奋剂的药物，就会受到过量刺激而致命。

这项研究使民间医师和西医内科医生意识到彼此的亚文化，这样可以降低死亡率。这也证明了自观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在这项研究中，民间医师与内科医生的现实是相互矛盾的，需要一种他观的方法从外部的视角，来构建这种医疗和文化现象的全图。

他观视角是对于现实的外部的、社会的、科学的视角。绝大多数民族学家先从自观的立场开始收集数据，然后既根据当地人的立场也依靠自己的科学分析来弄清他们收集的东西的含义。我经常从对形势和群体的自观的理解来进行我的研究工作。令人满意的引入、记录和表达这一观察方法要用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或者几年。尽管花费很多时间，但这种方法保证了我的数据有效和有用。与此同时，只有当我回过头来，既从自观又从他观的方法来弄清情况的时候，这项工作才算完成了。

非判断性的取向

非判断性的取向需要民族志学者们暂时放下自己对于某种给定文化现实的价值评判。保持非判断性取向有点类似于当你看电影、电视或者看书的时候暂时把怀疑的态度放在一边——接受一些看起来明显不合逻辑或者不可信的情况，以便让作者能够将这个故事继续下去。

关于这一原则，我在西奈 Sinai 大沙漠中与贝都因阿拉伯人在一起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试图不让自己关于西方健康学和一夫一妻制的偏见在我的写作和与他们的交流中流露出来。我说“试图”是因为我对待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一位脸和脚的皮肤都粗糙的象兽皮一样的贝都因人——的反应远远不够中立。我非常吃惊，我敬佩他在艰苦环境中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他在整个大沙漠中从一个水孔走到另一个水孔。但是，我对于他衣服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尤其是骑了一段时间骆驼之后）的反应是远远不够公正的。他让我穿他的一件外套来防暑，我当然要感谢他，我并不想触怒他们，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整天里，在干燥炎热的沙漠中我浑身散发着骆驼身上的气味。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需要这件外套，因为我们离目的



地——圣凯瑟林修道院只有一、两公里的距离，但是这短暂的旅程好象永远没有完结——一会儿是布满岩石的小径，一会儿又要经过峡谷。我们好象是在沿着一条隐蔽的水道迂回前进，而不是直接走向修道院。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那件外套，我早就中暑了。沙漠如此之热，汗很快就被蒸发掉；一个没经验的旅行者不会注意到气温已经高过 130 华氏度。这件外套减缓了汗水蒸发的速度，保持住我体内的水分。假如我当初拒绝穿这外套，也就意味着我拒绝贝都因人的保健法，那我可能已经被烤焦了，我也就永远不会明白他们在生活总是要多么用心地考虑到“水”——沙漠中最宝贵的资源。

很简单，关键是民族志学者在看待另一种文化时一定要尝试着对不熟悉的情况不做价值判断。但是也不可能完全中立，我们都是我们自己文化的产物，我们有自己的信仰、偏见和个人的品味。社会化在我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但是，民族志学者可以克服比较明显的偏见，试图用公证的立场看待另一种文化。民族优越感——认为本民族优于他民族，迫使另一个民族接受本民族的价值和标准——是民族志学者致命的错误。

三、传统的方法和技术

民族志学者是一种“工具人”，凭着他们的意识、思想和感情，这个“工具人”成为最敏感和最有知性的数据收集工具。然而，这种工具收集的信息也可能是主观的和具误导性的，田野工作者在陌生的行为和形态的迷宫中可能会丧失自控。民族志方法和技术可以为民族志学者在个人观察的荒野中指引方向，并且可以帮助准确的辨认和厘清那些构成社会现状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和行为。民族志学者穿越社会和文化荒野的长途旅行始于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许多社会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标志。这种方法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与自然环境中的人们长期共同的生活。民族志学者在当地的环境中展开研究，以便在人们真实世界的激励与束缚中观察他们和他们的行为。这种自然主义者的方法避免了控制性研究的人为的结果。要理解世界——或者是这个世界某些微小的细部——需要从它的复杂性之中研究它。

民族志学者最典型的方式是以一种非正式的方法来开始他的田野研究，比如不管在哪里，只要他们能“混”进一户人家就开始工作。最常用的技术是判断性抽样——即民族志学者根据所研究的问题，靠他们的判断来选择某一个亚文化群中或一个单元中最合适的成员来研究。这种方法是自然发生的，要求民族志学者问所调查的人们最简单、直接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志学者是善于利用各种条件的高手，各种自然的机会、便利和运气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有一些有经验的民族志学者用严格的随机抽样来开始他们的工作——尤其是当他们对所要研究的文化群体或单元已经知之甚多的时候。

社区成员的引介是民族志学者进入社区最好的途径，而自己径直走入一个社区，可能使民族志研究遭受一瓢冷水。社区成员可能对研究者本人和他的工作不感兴趣。有一个中间人或介绍人可以打开通常对外人紧锁的社区之门。这个引见者可能是一个首领、长老、领导人、老师、流浪者或者帮会成员，他们应该与该群体有一种信任关系——或者是其中的一员，或者是他们的朋友或同事。中间人与群体的关系越亲近越好。在研究开始的时候，群体成员对于中间人的信任，大体上都可以延伸到民族志研究者身上。如果有恰当的人引见，民族志学者会受益于他的光环效



果，群体成员会免去对研究者的“怀疑”和“考验”，自动把研究者归入“无害”的人中，只要民族志学者证明他值得被研究群体信任，他就可能会做的好。强有力的推荐和介绍可以提高研究者研究的能力，也因此可以提高数据的质量。

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是大多数民族学研究的特点，也是有效的田野研究的关键。参与观察既要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中去，也要求研究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能够充分的观察和记录数据。

参与观察要沉浸到一种文化中去。理论上说，民族志工作者要在被观察的社区中生活和工作六个月到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逐渐的学习语言、观察行为方式。长期的居住有助于研究者将被研究群体的基本信条、恐惧和希望都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去商场买东西或者去井边打水这种简单的、仪式性的行为可以显示出人们如何利用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如何决定什么是重要的、神圣的，什么是肮脏的。

我住在以色列的时候，注意到一些行为方式总是永无止境的重复着：公共汽车的乘客们对炸弹威胁已经从容对待；士兵和他们无所不在的乌奇兹半自动步枪成为木雕的一种；而基布斯公社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循环，则伴随着流汗、流血、伤筋动骨，还有不同季节的假日和节日。

把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的过程是复杂的，但是一个好的民族志学者从基础起步。参与观察从第一个问题开始——甚至是象“浴室在哪儿”这么简单的问题。找浴室或者是找供热器的煤油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社区的地理情况和资源。渐渐地，研究者就学会该问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发问，问题也就变的更加明确了。

无论如何，研究者知识的获得和理解力的提高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开始是关于社区的全景，然后逐渐推进，聚焦在对微观细节上，接着又拉回到大的图像上来——但是这一次要伴随着对细节更深刻的洞察。随着田野工作者逐渐拓展观察的广度和深度，焦点也反复的缩小、扩大。只有撇去表层、深入到内部的时候，民族志学者才能够描绘出细节丰富的文化景观，他人才能够理解和欣赏。

非反应性的手段 (Nonreactive Study)

在行为和话语之外还有大量需要被探究的信息。非反应性研究 (nonreactive study) ——关于文字作品、物质结构的尺寸和质量、雕刻的画、珠宝和各种各样的物理线索——都提供了对被研究群体或文化的深入观察。这些东西可能只是为深入调查提供线索。但是，关于行为、语言、和物理线索的观察对于勾勒被研究群体的“完形” (gestalt) 很有帮助。城市的房屋——摇摇欲坠的或被烧掉一半的房子，太空塔，毒贩子在光天化日做他们的交易——这些与那些金融区里闪闪发光的新摩天大楼，身着昂贵西服、提着高级皮箱的年轻经理们一同形成引人注目的经济反差。查阅财政预算也是了解人们价值观的好途径：人们通常会把钱投到对于他们重要的事情上。

四、结论

并不存在一条可以了解任何情境、任何文化群体的万能的道路。但是，一些基本的个人性格和价值观可以特别有利于这种工作，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一个人在这条路上迈出最初的几步。同时，传统的概念、方法和技术也可以使这趟旅行更加愉快和更易理解。田野工作者需要不断的调整和修改自己的方法，开辟新的道路，发现新的疆域。读一读走过类似道路的人写的旅行手册

